

美国华人创新型美术与设计工作者
骆南植先生

《摇摇欲坠的百年黑店》
时事评论漫画和

《关于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
书面谈话备忘录》



这幅漫画题为《摇摇欲坠的百年黑店》（The Collapsing One Hundred Years Old Black Shop），试图对中国国民党近百年历史中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种下许多恶因（诸如数次发动内战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白色恐怖”滥杀无辜、“图利资本压制劳工”丧失民心，等等）、导致现今惨遭报应，在台湾面临被“清算斗争”、“扫地出门”的亡党危局，做出一个

发人省醒的描绘。中国台湾国民党目前思想守旧，派系纷争、面对许多严重历史问题无法彻底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对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问题裹足不前，令人失望。目前国民党内保守派系我行我素，在自欺欺人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的鬼话中自我安慰，拒绝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所谓的“中华民国”，无论是在形式上奉行西方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北洋政府，还是公然实行法西斯主义“白色恐怖”、“一党专政”的国民党蒋介石或汪精卫政权，都从来没有真正统治过全中国所有领土，并且由于造成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血光之灾，已经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所弃绝。1947年2月28日中国台湾爆发各族群、各阶层人民联合大起义、1949年中国大陆人民“用枪杆子投票”把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踢出政坛，已经在事实上推翻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1949年已经丧失了90%以上的领土和人民，“国已不国”，目前在中国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存在的残余政权结构只有“中华民国”而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或者讲得客气一点，叫做“前‘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现存统治当局”（The Current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the Former Republic of China），就象已经被推翻的“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或者“前西班牙共和国”等“失败的国家”那样。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曾经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指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早在1950年10月13日“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一次党内会议中发表《复职的使命与任务》演说中坦承“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并且在亲笔手稿中多次提及（网页：<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EGvqrnkqU>）。本人认为，马英九先生不应当公然否定蒋介石总裁关于“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的正确论断，宣称“中华民国还要继续生存一百年”。这是除了蓝营支持者外，近百年中国内战其它各方的支持者的子孙后代所无法接受的。马英九先生近年来多次公开宣布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接受他所谓的“政党轮替”式的“民主制度”，不为中国大陆极少数人士的“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平反”，就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谈判统一。美国某家亲“蓝营”的华人报纸曾经发表台湾人士文章，痛骂并质疑马英九先生是否想当“阻挡国家统一的乱臣贼子”。中国台湾国民党新生代领袖洪秀柱女士在前一次台湾“大选”前曾经指出：“不能再提‘中华民国继续存在，否则就是两国论，’虽然洪秀柱女士竞选‘大位’失败了，作为‘蓝营’领袖之一，能够放下历史包袱，承认事实真相，回归民族大义，是值得赞赏的。台湾结束‘白色恐怖’后，能够鼓起勇气，承认‘中华民国’已经灭亡的事实，是名闻遐迩的、无党无派的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李敖先生。

在2018年11月24日举行的中国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台湾人民弃绝了“台湾独立”路线，拒绝支持极少数操弄“反共抗中”意识形态的不良政客，选举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开明务实人士当政，这说明台湾人民已经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认识到“台湾独立”路线对于台湾经济危害极大，是完全无法成功的白日梦想。这是有利于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大局的，同时也为中国台湾国民党起死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蓝营”人士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蓝营”这次选举获胜，并不等于“中华民国”已经“复活”、更不等于台湾人民认同“蓝营”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推行‘独立的台湾’路线、拒绝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方案的所谓‘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式的‘鸵鸟政策’”。事实上，在这次台湾地方选举中获胜者，正如中国北京媒体人士梁隽先生发表在美国《侨报》2018年11月29日A6版的题为《民进党大败并非意味着国民党胜利》一文所指出的那样，“要么是地方派系，要吗是非典型国民党人，正统的蓝营色彩人选如丁守中，反而并不出彩”。其中最突出的“非典型国

民党”当选者是大打“大陆牌”的韩国瑜。美国《侨报》2018年11月26日A5版题为《导致台湾“蓝绿变天”的三大变化》社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经济在民进党治下并没有改善”，“人民想改变”，“民进党执政这两年多，经济搞不好的一个原因是两岸关系不好”，“从缓和与合作转向冲突”，草根的韩国瑜正是因为“不像国民党”而获胜。这次“非典型”蓝营地方派系的胜利，在很大的程度上，绝对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执政理念比民主进步党的理念更好，而是因为民主进步党的“台湾独立”路线造成海峡两岸关系紧绷，大陆游客大量减少，造成绿营在台湾南部的“革命根据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观光旅游业哀鸿遍野，大陆商人抵制台湾产品，造成台湾经济在整体上一片萧条、局部上濒临崩溃、台湾人才无法忍受“低工资、低福利、低待遇”的经济窘境，纷纷移民大陆；台湾教育资金不足，质量下降，本地学生大量就读大陆高等学府。美国某家亲台湾的中文报纸2018年12月6日B5版题为《少子化冲击大专172系停招生》一文中坦白承认，“台湾生育率全球第三低”，“台湾劳工不愿生孩子的前三大原因，分别是钱不够、买不起房、工作过于忙碌”，“2019学年度全台大专院校共有172个系所停招”，包括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和技术职业院校共76个系所。完全是一副穷途末路的惨象。总而言之，只要“绿营”或“蓝营”中的任何一方，继续坚持“反共、抗中、不统”的政策，台湾日益走向没落，最终在国际主流社会大多数国家、以及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人民的联合抵制下，走向“邦交国归零、境外贸易归零、人才归零”的可悲结局，是在所难免的。中国台湾国民党若想真正在台湾起死回生，并且在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的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人民的政治生活中真正有所作为，就必须鼓起勇气，拿出诚意，面对海峡两岸目前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贸易、在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中的联络工作、和外交等各方面力量对比的新状况，作出务实开明的历史性选择：

（第一）承认联合国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最高权威、接受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接受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法理地位已经终结；接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普世共识（或叫做“一中同表”的新共识）。这样做，也是对国民党前总裁蒋介石先生早在1950年10月13日“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一次党内会议中发表《复职的使命与任务》演说中坦承“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的正确论断的尊重。

（第二）痛下决心实行“第三次改造运动”：中国台湾国民党要在台湾和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起死回生，就必须同下决心，实行“三项重大变革”或者叫做“三大自我革命”：

（一）告别“革命”拥抱改良（第一场“自我革命”）：放弃“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不切实际的“革命”口号、企图“政治反攻大陆”的白日梦想，并且立刻停止一切“反共抗中”、分庭抗礼、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颠覆国家政权”的毫无成功希望的不当政治行为，停止插手干扰大陆和香港人民内部的政治事务。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主导的“革命”政党，由于两次发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内战，给国家民族造成永远无法补救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最终丧失中国人民的支持，“革命”堕化“反革命”，许多党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参加反对新政府的叛乱活动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国民党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

命”理想已经破产了，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合法性、现实必要性，放弃一切“重起炉灶”、“以拖待变”、“推翻中共、恢复‘中华民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仿效历史上两次“改造运动”的有益的经验教训，实行“第三次改造运动”，成为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制内活动的合宪政党，拥抱改良，告别“革命”，“改良才是真革命。国民党“第一次改造运动”发生在 1920 年代的中国大陆，通过学习苏联共产党经验而起死回生；国民党“第二次改造运动”发生在 1950 年代的中国台湾，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经验而起死回生；国民党现在为了度脱亡党危局，极有必要学习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实行“自我革命”、实事求是、重新认识自身历史的有益经验，重新审视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的种种错误，向中国大陆人民赔礼道歉，才能够获得谅解。国民党只有通过“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式的“自我革命”或“第三次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政治管理体制中的一个“参政党”或“民主党派”，才能够彻底转型为一个为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中大多数同胞所接受的合法的、非颠覆性的、改良型的现代中国民主党派。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望“蓝营”人士与时俱进，超越历史，开拓未来！

（二） 超越自我拥抱宿敌、化敌为友包容共赢（第二场“自我革命”）：世界上的各国人民，无论种族或是阶级，在政治认同的问题上，基本上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两大因素，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意识形态”来做决定。就“历史恩怨”而言，中国近代历史中曾经活跃过的各派政治势力（无论“左、中、右”标签，包括满清政府、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内蒋介石一派以外的“非嫡系”）及其子孙后代，都曾经是国民党多次发动血腥内战的受害者，并且因为国民党及其在海内外人数越来越少的支持者至今死抱著“党国一贯正統”、国民党“一贯正确”的唯我独尊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陈腐心态，拒绝同历史上打著“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旗号多次发动内战、祸国殃民的沉重历史包袱做一个干净利索的彻底切割，上述的“非国民党政治势力”不可能支持国民党继续以“中华民国”名义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台湾）国民党如果希望同中国近百年来血腥内战的受害者的子孙后代实现民族和解，就应当拿出诚意，同历史上数次发动内战、以毫无必要的军事手段解决政治分歧的血腥历史作一个彻底的切割。从 1905 年 8 月 20 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侵华团体“黑龙会”领袖头山满提供的民宅二楼榻榻米房成立，到 1954 年国民党“反共游击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的武装叛乱结束，在短短的 43 年当中（1911 年至 1954 年），中国国民党发动了 7 次内战，平均每 6 年一次，堪称“内战内行”、在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些内战包括：

（1） “辛亥革命”：在日本侵华团体黑龙会赞助和积极参与下推翻君主立宪的大清帝国合法政府、给中国带来军阀混战群龙无首的血光之灾。

（2） “二次革命”：1913 年，正当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促进现代经济迅猛发展，包括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甚至反对袁世凯大总统的言论都可以自由发表，全国人民生活在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中，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洋政府中合法地参政议政的时候，国民党

激进派竟然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以至于“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参见百度网站文章：<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AC%A1%E9%9D%A9%E5%91%BD>）。

（3）北伐途中血腥“清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军事政变，屠杀中国共产党同盟者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导致“第一次国共内战”。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数不过5万；“清党”却屠杀50多万人（所谓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结果是共产党“越杀越多”）。

（4）党内自相残杀：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内战，如1929年3月至6月期间蒋中正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广西新桂系势力之间的“蒋桂战争”，和1930年5月至11月即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中国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中原大战”（蒋冯阎李战争）。

（5）“福建事变”：1933年蒋介石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人民革命政府”之间的内战。

（6）抗日战争期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如瓦解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屠杀牺牲抗日同盟的“晋西事变”，派驻重兵围堵陕甘宁边区，等等。

（7）抗日战争“惨胜”后立刻发动第二次“反共”内战：造成经济崩溃，民怨沸腾，大批军队倒戈，“国民政府”被迫“偏安”台湾。长达91年（1927年至2019年）的国共内战至今没有结束，海峡两岸至今无法统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台湾地方以及海外（主要在美国）的“泛蓝营”势力赞助、参与策划四次“反共抗中高潮”均以失败告终：（一）“六四事件”：插手1989年北京、上海等地社会动乱（所谓的“民主运动”），发展成为群体暴力事件，严重干扰改革开放。（二）“地下教会”：披上“宗教外衣”，建立非法地下组织，拒绝按照合法程序向政府机关登记，图谋不轨，不得人心。（三）“邪教”：打着“练气功”旗号从事颠覆国家政权活动。（四）插手香港“占领中环”：破坏经济，扰乱民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台湾国民党如何才能做到“超越自我拥抱宿敌、化敌为友包容共赢”呢？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与时俱进、革故鼎新”，首先，应当从最新版本的《中国（台湾）国民党党章》（2018年8月19日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十二次修正）删除所有“我是它非”、“唯我独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利于中国（台湾）国民党同近百年来的“宿敌”的子孙后代实现民族和解的条款，如“领导国民革命，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传统革命精神”、“反对共产主义”等等“蓝营党八股”。可以考虑修改《党章》中的《前言》和《总纲第一条、第二条》：前言：“中国国民党，系总理孙中山先生创立，历经艰难险阻，由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一脉相承，历久弥新，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有过光荣爱国传统，在收复台湾领土后，推行土地改革、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后实施民主宪政，追求国家富强统

一，始终如一。中国国民党痛感过去近百年来由于内战，给海峡两岸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本党愿意同过去内战中的其他各方面（包括满清、北洋、中国共产党、以及本党内部曾经遭到镇压的派别）的支持者及其子孙后代，实现无条件的和解，承认过去内战中的其他各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所做过的贡献。愿所有各方面超越过去，开拓未来，实现民族大和解、民族大团结、民族大合作，求同存异，精诚团结，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我全党同志，秉持光荣爱国传统，互策互励，共信共行。” **第一条：**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本党）为民主的、公义的、创新的全民政党。本党基于三民主义的理念，建设台湾地区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本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目前实行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管理体制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合法性、和现实必要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地区目前实行的以‘功能组别’为基础的、‘行政主导’的有香港特色的政治管理体制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合法性、和现实必要性，并且庄严承诺不干预大陆和香港地区人民内部的政治事务。本党同中国共产党和大陆地区民主党派，尽管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人类社会进步的世界大同理想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应该而且可以求同存异，建立互信互助的同胞伙伴关系。本党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海峡两岸各自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互相借鉴，求同存异，共同建设均富、统一、公义、和谐、稳定的大中国。愿海峡两岸实现民族和解，亲爱精诚，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国的复兴，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求同存异，共济共荣，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礼运大同篇》所阐述的伟大理想”。 **第二条：**“本党结合全国及海外信仰三民主义之同胞为党员，恪遵总理总裁与蒋故主席 经国先生之遗教，在中国台湾地区融合族群，团结全民，复兴中华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反对分裂国土，坚定‘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信念，并同海峡对岸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同胞精诚团结，共同为中华民族之整体利益而奋斗”。中国台湾国民党内部“反对共产主义”的不合时宜的“右翼极端主义”顽固势力企图“以拖待变”、期待通过“颜色革命”的手段“推翻中共、恢复民国”的“春秋大梦”已经破产了。顽固势力不识大体，继续把“自由、民主、均富”的口号旧调重弹，不顾现实、妄自尊大，只能让海内外有识之士加快抛弃国民党。2017年1月份中国台湾国民党前领导人洪秀柱女士来美国洛杉矶筹款，参加活动者寥寥无几（仅有两三百人参加，而当地华侨华人有十多万），占美国华人总数百分比小得惨不忍睹，说明继续以“中华民国”名义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共识，分庭抗礼，鼓吹在“中华民国宪法”下，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已经严重脱离现实，等于开空头支票，自欺欺人，永远无法兑现。美国洛杉矶地区华人华侨人口十多万，但是每年“蓝营”人士领导的、在中国城“中华会馆”附近孙中山铜像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活动参加者不超过100人到200人，说明继续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争夺正统地位”的分庭抗礼行为已经丧失群众基础。国民党要在台湾和海外华人、华侨社区中，“把人心换回来”，只有面对历史，面对现实，承认前总裁蒋介石先生1927年4月12日发动军事政变篡夺当时国民党最高政治权力，设立非法的“南京国民政府”，引起国共两党几十年内战的严重错误，承认蒋介石先生早在1950年10月13日“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一次党内会议中发表《复职的使命与任务》演说中坦承“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并且在亲笔手稿中多次提及的历史事实，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合理方案，停止使用已经被海内外中华各族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抛弃了的“中华民国”旧国号、旧年号、充满“党国体制”色彩的、不符合国际主流社会“普世价值”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旧“国旗”、《三民主义》旧“国歌”，把非法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残余旧政权架构和平地转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特别行政区合法地方政府，采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目前使用的公元纪年，接受“五星红旗”作“我的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我的国歌”，并且接受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上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表决通过的《第 2758 号决议》，和国际主流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共识，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旧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国民党从此审时度势，改名为中国台湾国民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目前管理体制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合法性、和现实必要性、停止一切分庭抗礼、“颠覆国家政权”的非法或不当言行，不再干预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人民的内部政治事务，从今以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中国台湾地区人民的生存条件，才能够消除中国大陆、香港、澳门 14 亿人民、以及海外 6,000 多万华人华侨当中绝大多数人士对于国民党企图回到中国复辟“中华民国”、极有可能再度引起内战内乱的忧虑，从而放心地支持国民党在台湾继续生存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只能继续“两面作战”，既无法取信于海外同胞，又不见容于中国台湾人民，更得不到中国大陆人民大众的支持，只能随著时间推移，“慢水煮青蛙”，把蓝营前途逐步葬送。中国台湾国民党只有尽快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唯一的正确选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统一进程，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切实可行的方案、达到海峡两岸互相尊重、互利共赢，才能够对中国百年来的“内战内乱、国家分裂”的不幸历史有所交待，才能够重新取得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否则，企图“拖以待变”，造成久拖不决，夜长梦多，将逐步丧失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人民的信任，逐步走向“泡沫化”，这样可悲的结局，实非国民党之福也。

（第三）与时俱进吸纳新血、推陈出新起死回生（第三场“自我革命”）：中国台湾国民党目前存在著严重的组织结构老化、党内山头林立、党魂党德沦丧、政治理念陈腐落伍、同年轻一代的理念脱节的问题。要救亡图存，度脱目前面临的亡党危机，只有与时俱进吸纳新血、推陈出新起死回生。具体来说，就是应当多吸收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和包括“外省人”和“正港台湾人”在内的年轻一代（包括“二二八革命”和“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后代），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咸与维新。还应当大力开展海峡两岸青年组织之间的互访交流，化解理念分歧，共同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时俱进，自我完善。

骆南植先生 《关于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 书面谈话备忘录》

中国台湾国民党前领导人馬英九先生，不顾国民党在台湾内外交困、面临被民主进步党政权“清算斗争、扫地出门”的亡党危局，竟然不断发表“反共抗中拒统”的不当言论，实在令人遗憾。馬英九先生多次利用纪念抗日战争的机会替国民党抢功劳，并且公然贬低甚至否定其他爱国力量的功绩。馬英九先生说什么“8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抗战胜利是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英勇奋斗的成果，不容任何人篡改和扭曲”。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白色恐怖”时期“党国八股”和“洗脑教育”的翻版。事实真相胜于雄辩。如下事实馬英九先生证明。

（一）早在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之前，1931 年 9 月 18 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地区已经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关东军，比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抗日早 5 年；

（二）8 年抗战前期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打了几场大城市保卫战，但是由于政治腐败、战略错误而丧师失地。国民党抗战初期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苏联军事顾问鼓励大打正规战、阵地战，国民党军队盲目听从苏联军事顾问瞎指挥而损兵折将，只好退到西南地区凭借天然屏障、并且依靠苏联空军和美国飞虎队保护才免于亡国灭种。苏联军事顾问在“北伐战争”期间也是鼓励国民党军队大打正规战，并且帮助国民党推翻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被推翻除了治国理念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是军备落后、缺乏外援。苏联军事顾问在抗战初期鼓励国民党军队大打正规战，面对的却是兵强马壮、现代化的、被深度洗脑而视死如归的日本军队，充满封建落伍毒素、内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只能惨败。只有寄居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郭汝瑰将军在 1938 年武汉会战前建议以“运动战”和“消耗战”、配合敌后袭扰逐步消耗日军，才没有造成重大伤亡，成为例外。类似郭汝瑰将军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当时的国民党内人数不少；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国民党来说是模范的“忠贞党员”，一旦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就阵前倒戈。郭汝瑰将军的战术正是毛泽东主席抗战期间所使用的以弱胜强的法宝。国民党因为战略错误，损兵折将，不得不强拉壮丁入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引起民怨，为日后政权崩溃种下恶因。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又叫做“中华民国特区政府”）自从“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之后事实上已经同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分道扬镳，采用独立自主的、适合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实际情况的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正确的军事战略，不再听命于重庆政权的瞎指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人民战争”军民一家，以少胜多，逐步获得北方地区大多数人民支持，牵制了大量日军，中国才避免亡国噩运。事实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境内存在六股互不隶属的政治势力，即**

抗日阵营：（1）国民党蒋介石重庆政权，（2）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民国特区政府”，（3）中国共产党满洲地方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因为地理条件限制，实行内部自我领导），（4）国民党新疆盛世才政权（没有直接参加抗日，滥杀无辜劣迹斑斑，两次企图做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有违民族大义，但是推动新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帮助运送苏联的大批军火物资到国民党抗日前线，功不可没），以及
亲日阵营：（5）国民党汪精卫南京傀儡政权、和（6）满洲国傀儡政权。

鉴于以上事实，抗战期间中国事实上并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国共两党是各自为政的。馬英九先生“抗战胜利是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英勇奋斗的成果”和“8年抗战，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皆由国民政府领导”的说法完全是自我吹嘘。馬英九先生所谓的“国民政府”指的当然是抗日的国民党蒋介石重庆政权，它在“法理”上或形式上当然是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但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整个14年抗日战争期间，前6年在东北地区的地方军事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在实际运作中，因为地理条件限制实行内部自我领导，无论是同设立在南京的蒋介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或是同设立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事实上都不存在直接的“领导被领导”关系。国共合作的后8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既没有让苏联派驻军事顾问瞎指挥，也不听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乱调动。**毛泽东主席对抗战胜利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顶住了苏联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同日本军队死拚硬打的压力，顶住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适合苏联国防需要、为国民党吞并中共党政军组织实行“一党专政”的目的服务、不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进步事业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坚持按照中国国情和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对比的实际形势，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战略方针，灵活机动地同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周旋。**

毛泽东主席这样做是绝对正确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曾经大力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有利于人民大众的进步政策，但是并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当时的中国内部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难于化解，军事工业极端落后，即使全国一致对外也无法做到依靠本国力量战胜日本，更何况蒋介石政权在民族危亡的困境中继续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如发动“皖南事变”、“晋西事变”屠杀大批共产党抗日军人）。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被迫请苏联出兵对付日本关东军，以出卖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定》做交换。**如果毛泽东的军队也象蒋介石的军队那样大打阵地战，只能以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亡党而告终，日本就可以集中兵力消灭蒋介石的重庆国民党政权，中国就彻底亡国了。所以说，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失败、退避四川后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道路。**馬英九先生最不幸的错误是看不清历史潮流，看不清国民党所面临的“泡沫化”亡党危局，不肯彻底放弃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反共抗中”的大陆政策，继续以“中华民国”名义分庭抗礼。所谓“反共抗中”，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地位，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大政方针，“以拖待变”，希望中国共产党因为走回“极左路线”或“贪污腐败”而引起“颜色革命”被迫“开放党禁”，让国民党在大陆死灰复燃，实现“政党轮替”重新上台。

俗话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反腐败战役取得辉煌成果，整顿经济秩序、消除各种“泡沫”，改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人民大众的社会福利，消除私营企业中严重而普遍存在的各种侵犯职工合法民主权利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侵犯知识产权、“山寨版”和仿冒假货到处泛滥成灾、“潜规则”盛行、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破坏国家正常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体制的违法现象，加强国家安全措施，依法惩办有“台独”和“独台”背景的“颠覆国家政权”犯罪分子，消除社会动乱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宣布中国进入习近平新时代，进一步提高了国家管理制度的效率和稳定，为中国进入以创新型经济为基础、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化为价值导向的和谐社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习近平主席领导反腐败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除掉了社会上各种经济犯罪行为的“保护伞”后，中国政府再接再厉，整顿经济秩序，依法惩治各种偷税漏税犯罪活动，深得广大遵纪守法的人民大众拥护。2018年10月3日中国政府查实“电影明星”范冰冰重大偷税漏税案件，罚款8.8亿人民币（约等于1.3亿美元），并且继续调查台湾“外省人”（祖籍山东省）、范冰冰的经纪人、“背景极深”的某位台湾娱乐圈幕后推手在2018年6月，在税务机关展开调查期间，指使公司员工隐匿、故意销毁涉案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阻挠税务机关依法调查，涉嫌销毁犯罪证据的问题（网页：<https://kknews.cc/zh-hk/entertainment/g964bal.html>）。台湾“外省人”中的极少数的所谓“精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凭借特权，假公济私，胡作非为，形成一种“见怪不怪”的奸商作风，在国际上臭名远扬。这一小撮经济犯罪分子长期利用海峡两岸微妙关系，“两边通吃”，受到惩处是咎由自取。

最近，中国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先生提倡民营企业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共享利润，引起热烈探讨。工人参与管理、共享利润在英国、美国、德国、瑞典等西方先进国家的许多企业中已经实行数十年。假如条件成熟的中国民营企业能够向这个方向平稳过渡，将有助于消除内部各种矛盾，同国际主流社会的现代企业先进实践接轨，为从利用廉价劳动力出口廉价低档产品的“出口加工型”经济向以提升劳动力素质、用合理的收入和福利调动职工积极性、依靠自主创新的中高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国际品牌良性竞争，推动中国经济加速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应对中美两国“贸易战”下的种种挑战，缓和紧张局势，不失为一项可以温和渐进地试行和推广的德政。英美等西方先进国家的许多大型跨国企业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共享利润”，决不是像中国某些对国际主流社会目前经济体制一知半解的所谓“产政学界精英”（包括某些“海归”大学教授）或“民间精英”（保守派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财产安全问题”、“大锅饭、铁饭碗、刮共产风”，或“消灭私有制”，也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会一落千丈，甚至国家有可能陷入贫困和动荡”。恰恰相反，这样做，有助于中国民营经济升级换代，同国际接轨。某些“产政学界精英”或保守派人士，在中国政府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网站上发表许多十分偏颇的不当言论，说什么“邓小平改革路线最辉煌的成果却进入40年来最危险的时期”，“外界担心一场新的公私合营指日可待。中央的经济政策背离市场化、法制化，社会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扭曲和不公正”，“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工人参与管理的做法不该针对私人企业，而该是国有企业，也就是过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才要共管共享，而不是私人的企业”，如此等等。这是一种“右派”的立场。另外一种形“左”实右的“私营经济退场论”更不可取（幸亏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乾纲圣断，继续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否则形“左”实右的妄议国政将泛滥成灾）。以上两种“左”右倾人士妄议国政的

奇谈怪论实在大谬不然。“邓小平改革路线最辉煌的成果”虽然辉煌，让民营企业在政府保驾护航下，在短短三十年中完成了欧美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形成了一个“富可敌国”、“财大气粗”的“土豪”阶层，但是不要忘记了，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这三十年中的发展也确实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包括（1）中国民营企业内部“土豪”阶层同“工薪阶层”的经济利益分配和政治参与机会不平衡的矛盾；（2）中国民营企业内部“土豪企业家”阶层当中的极少数不法分子为了追逐超级高额利润，行贿贪官，偷税漏税，经济犯罪率高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数倍，甚至出现“长春长生疫苗”、“拼多多”、“P2P”等严重事件，对遵纪守法的国有企业和其它民营企业形成不当恶性竞争，动摇国本，并且引发社会动乱；（3）中国民营企业中许多人热衷于制造假货，大搞“山寨版”，侵犯消费者权益，而且引起国际主流社会企业界极端不满，成为引爆中美两国“贸易战”的重大根源之一，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和世界贸易体制的稳定。中国民营企业家普遍缺乏“社会企业”、“社会慈善”、“社会服务”观念，对于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往往非常小气，同拥有的财富数额不成比例，但是喜欢跑到澳门和美国赌城豪赌，每次数万至十多万美元不等，甚至带领来自中国的贪官豪赌。出手十分大方。中国国内博彩业研究专家表示，保守估算，中国内地每年有将近 6000 亿元人民币（1000 亿美元）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超出中国政府每年外汇收入将近一倍！并且是所谓“公款吃喝”每年 3000 亿人民币的两倍！）。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唯利是图，缺乏道德良知和做人底线，投机钻营，见缝插针，那里有“热门”机会便插上一手，对于提高本行业经营水平兴趣不高，对于投资创新性产品开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中国民营企业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大多数规模小，靠为外国企业加工生产低档次产品或零部件维持运营，缺乏自主创新设计的“拳头产品”，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属于“几十个人、七八十条枪”的、胡传魁式的“杂牌军”的档次，没有能力同国际主流社会跨国公司的规范化、规模大的“集团军”相匹敌，因此，在当前国际贸易战的大格局下，举步维艰，一部分企业甚至面临“退场”绝境，只能依赖中国政府救济才能勉强生存。中国民营企业七万家茶厂在年产值上敌不过英国一家“立顿”（Lipton）跨国公司。中国作为茶叶的发源地，却没有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茶品牌（参见网页：<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310/00572717587.shtml>），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要跳过这个“最艰难的时期”，解决办法的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或者抵抗“工人参与管理、共享利润”、“混合所有制”的新政，更不是要求国家“松绑”或“减税”，而是痛下决心，根除民营企业内部固有的种种乱象，与时俱进。**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的是，中国民营企业过去三十年追求财富的模式已经走到了“瓶颈”，今后必须走上主动配合政府，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自立更生依靠自己的资金培养和使用人才、创造自己的品牌、开拓自己的国内市场的新的方向。**美国《侨报》2012年12月18日A2版题为《中国亿万富豪近三成已移民》一文指出，“尽管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很多中国富豪还是担心国家会对拥有非法财产的个人展开‘秋后算账’”；“27%亿万富豪已移民，47%在考虑”。**中国富豪在美国各大城市大笔现金购买豪宅和投资公寓，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引起美国主流社会中下层人民大众不满。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中国私营企业家保护私有财产的最佳方案，不是移民海外，坐吃山空，而是根植本土，自我改良，否则，不需要任何形“左”实右的政治势力的外部压力，民营企业从内部崩盘，“自我清场”、“国进民退”，为期不远。相信大多数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会做出审时度势、开明正确的选择。无论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已经找到了顺势应变的方法。无论中国台湾国民党内部一小撮**

顽固势力如何盘算，趁着中美两国“贸易战”之机发动“颜色革命”的前景，在目前看来，前景还是相当黯淡的。

国民党内部顽固势力如此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的“颜色革命”的“春秋大梦”已经破产了。顽固势力不识大体，继续把“自由、民主、均富”的口号旧调重弹，不顾现实、妄自尊大，只能让海内外有识之士加快抛弃国民党。2017年1月份中国台湾国民党前领导人洪秀柱女士来美国洛杉矶筹款，参加活动者寥寥无几（仅有两三百人参加，而当地华侨华人有十多万），占美国华人总数百分比小得惨不忍睹，说明继续以“中华民国”名义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共识，分庭抗礼，鼓吹在“中华民国宪法”下，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已经严重脱离现实，等于开空头支票，自欺欺人，永远无法兑现。国民党要在台湾和海外华人、华侨社区中，“把人心换回来”，只有面对历史，面对现实，承认前总裁蒋介石先生1927年4月12日发动军事政变篡夺当时国民党最高政治权力，设立非法的“南京国民政府”，引起国共两党几十年内战的严重错误，承认蒋介石先生早在1950年10月13日“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一次党内会议中发表《复职的使命与任务》演说中坦承“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并且在亲笔手稿中多次提及的历史事实，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合理方案，停止使用已经被海内外中华各族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抛弃了的“中华民国”旧国号、旧年号、充满“党国体制”色彩的、不符合国际主流社会“普世价值”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旧“国旗”、《三民主义》旧“国歌”，把非法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残余旧政权架构和平地转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特别行政区合法地方政府，采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目前使用的公元纪年，接受“五星红旗”作“我的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我的国歌”，并且接受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表决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和国际主流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共识，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旧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国民党从此审时度势，改名为中国台湾国民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目前管理体制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合法性、和现实必要性、停止一切分庭抗礼、“颠覆国家政权”的不当言行，不再干预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人民的内部政治事务，从今以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中国台湾地区人民的生存条件，才能够消除中国大陆、香港、澳门14亿人民、以及海外6,000多万华人华侨当中绝大多数人士对于国民党企图回到中国复辟“中华民国”、极有可能再度引起内战内乱的忧虑，从而放心地支持国民党在台湾继续生存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只能继续“两面作战”，既无法取信于海外同胞，又不见容于中国台湾人民，更得不到中国大陆人民大众的支持，只能随著时间推移，“慢水煮青蛙”，把蓝营前途逐步葬送。关于洪秀柱女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说（详见《侨报》网页：<http://www.uschinapress.com/2017/0120/1092519.shtml>），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从1945年10月25日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旧政权的“法统”结束这段时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治的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外蒙古。“中华民国”旧政权的“法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解体或灭亡，只是旧政权的“法统”转移给新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旧国号（“中华民国”）

被新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所以中国国父毛泽东主席在 1949 年 9 月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曾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又简称“中华民国”，但是海内外社会贤达周善培（“清末新政”时期的政治改革家、企业家兼慈善家）、陈嘉庚（马来亚华侨大企业家兼慈善家）、司徒美堂（美国华侨领袖）等“重量级代表”坚决反对，理由是“中华民国”这个旧“国号”是一块“烂招牌”，“与民无关，22 年更给蒋介石弄得天怒人怨”，“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古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毛泽东主席敬老尊贤，不再主张“可以又简称中华民国”（参见网页：http://guoqing.china.com.cn/2014-10/11/content_33732255.htm,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99045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陈嘉庚>）。某些无党无派的、尊崇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做出决定，终止使用国民党政权旧“国旗”、“国歌”、“年号”意义重大。“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令人产生“国民党高高在上（党旗位于左上角）、人民在底层血流成河（满地红的血红色）”的视觉印象，很不吉祥，所以才给中国带来种种噩运；“中华民国”的“民”字同“泯灭”的“泯”字发音近似，因而国民党统治中国才 22 年就灭亡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政权，因此，必须避之惟恐不及以免惹祸上身。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五星红旗”，同《史记》所记载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语相契合，是中华民族兴起的祥瑞迹象。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天宫书》中写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另有一种说法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出西方利匈奴”。这里的匈奴可以解释为前苏联。前苏联曾经长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以对立状态，结果苏联输了。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岁星、荧惑、镇星、太白和辰星五星如果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五星连珠”），则对中国有利。1921 年，出现过一次“五星连珠”星象，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位于中国东方的上海崛起，党权民授，最终击败国民党，坐了天下，成为各民族拥戴的人民执政党。根据预测在 2040 年的 9 月 9 日将会又一次“五星连珠”。据说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认为，伴随 2040 年 9 月 9 日正午 12 点会出现“五星聚会”奇观同时到来的，很可能是中国再次走向繁荣和富强。“五星红旗”的红色接近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传统社会中政府机关盖章使用的印泥的朱红色，是掌握权柄的标志，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江山固若金汤。新加坡的国旗也使用五颗星，据说独立时华人向往新中国并且尊崇传统文化，特地要求在图案上包含五星。相比之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红色是血红色，容易引起“流血成河”的不祥联想，而其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在视觉上有“咄咄逼人”的相当刺眼的感觉，并且曾经在 1949 年之前被中国大陆北方地区许多“非国民党”人士谩骂为“狗牙徽”。因此去年台湾名人张安国先生率领“蓝营”人士穿上印制五星红旗和“这是我的国旗”字样的衬衫在台北市游行，消灾迎福，是非常妥当的。

中国台湾国民党如果对中华传统文化存有敬畏之心，就应当顺应天意民心，尽快采用“五星红旗”作为“我的国旗”，才能在目前台湾“清算斗争”的刀光剑影中，以柔克刚，反败为胜。中国台湾国民党如果能够接受上述合理建议，在统一后的中国，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同胞应当可以接受下述特殊安排，在政治上对中国台湾国民党给予优惠照顾：

(1) 中国台湾国民党无论在台湾的地方选举中得票结果如何，可以享有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一样的“参政党”地位，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拥有同台湾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比相应的、合理数额的“法定席位”，参政议政。

(2) 除此之外，中国台湾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选举中，根据获得选民支持的程度，可以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拥有同台湾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比相应的、同台湾地方选举得票率结果相应的数额的席位。

(3) 除了政府机关、学校、研究机构、军事要地、商场等公共场所必须每天升五星红旗之外，在历史遗址，比如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南京前“总统府”、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或台湾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地点，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继续陈列或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旧国旗，同时在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文艺节目、影视中，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继续演唱或播放《三民主义》旧国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特别法律，以国家力量做后盾，保护中国台湾国民党在台湾合法存在的地位，以及“外省人”族群在台湾社会中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台湾地区任何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台湾地方政府完成《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公布有关“白色恐怖”真相，移除“白色恐怖”的“威权统治”象征，为二二八革命和民主进步斗争牺牲者树碑立传之后，不得继续为了在中国台湾的地方选举中捞取政治利益，炒作这一历史问题、制造族群纠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特别法律，保护中国台湾地区一切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并且向联合国有关机构申请“人类遗产”地位。

(6) 国家统一后，台湾统治当局（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除了政府改名为中国台湾特别行政区“人民政府”（沿用二二八革命中“欧巴桑”谢雪红在台中市成立的台湾人民自治政权的名称），“立法院”改名为台湾特别行政区人民代表大会，军队改名为中国台湾特别行政区“人民军二七部队”（沿用二二八革命中“欧巴桑”谢雪红女士等爱国人士在台中市成立的台湾人民地方军队的名称）之外，其它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事项，一律由台湾人民永久高度自治。

中国台湾民主进步党也应当顺应天意民心，尽快从党纲中删除“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过时的条款，接受台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下实行高度地方自治的唯一合理的选项。台湾民主进步党人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悬崖勒马，那么，在统一后的中国，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同胞应当可以接受同上述特殊安排相类似的优惠照顾。

骆南植先生 2018 年 6 月间曾经拜访某位美国华人精英领袖，她目前赞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但是提出是否能够用“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骆南植先生向她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根据考证，有“新旧”二种版本，其中的三个构成部分可以做如下分析：

第一，“民族主义”：

（一）“旧版本”：“旧版本”是 1905 年 8 月 20 日成立于日本东京赤坂区侵华组织“黑龙会”领袖头山满提供的民宅二楼榻榻米房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逐鞑虏”（把满族赶回东北三省）、和“恢复中华”（在明朝统治时的领土即“汉族十八省”建立“中华”新国家）的条款。这个纲领带有严重的“大汉族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而且错误地把西藏、青海、新疆、内外蒙古、满洲关外三省都排除在“中华”之外，犯了分裂领土或者对国家领土认知的严重错误（中国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前的“十八星旗”即是明证）。日本黑龙会成立的目的是吞并中国黑龙江沿岸东北三省和内外蒙古，并逐步控制蒙古和西伯利亚，由于积极参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战败投降后被麦克阿瑟将军主导的美国占领当局勒令解散。日本黑龙会领袖与许多成员积极参与“辛亥革命”，使得这场“革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受到新一代的中国和海外华人学者广泛质疑。

（二）“新版本”：“新版本的“民族主义”按照 1924 年 1 月 20 日在中国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的说法，“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执政期间，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个主张。（1）就“中国民族自求解放”而言，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扩大侵略战争的空前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组织抗日联军坚决抵抗，蒋介石政权却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继续剿共，大失军心、民心，导致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被逼无奈发动兵谏。抗战期间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半左右党政军人员投靠日本侵略者建立汪精卫汉奸政权，蒋介石的重庆国民党政权由于战略失误丧失大片国土，却继续剿共（“皖南事变”），引起美苏两个盟国政府以及海外侨胞强烈不满。抗战胜利，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一天（1945 年 8 月 15 日）蒋介石的重庆国民党政权竟然为了换取苏联支持国民党独占全部胜利果实，统治全中国（“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签订了《“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允许苏联在大连、旅顺驻军并且共管长春铁路长达二十年。国民党政权为了独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排斥异己，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其它党派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合情、合理、合法主张，竟然主动出卖领土和主权。这在当时激怒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他质疑古今中外，世界上哪有战胜国要割让领土并且让外国军队进驻的奇闻。陈嘉庚先生所捐资修建的集美解放纪念碑浮雕上的中国地图特意包括外蒙古，以表达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卖国求荣、祸国殃民弥天大罪的强烈抗议。1961 年外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非法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竟然为了一党私利，没有行使否决权。外蒙古脱离中国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而是长期被苏联驻军控制，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先生同苏联谈判，苏军从蒙古完全撤军，外蒙古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内蒙古，“独立”并不能当饭吃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亲赴苏联谈判，运用外交手段，迫使斯大林同意在 1952 年底向中国移交大连、旅顺、长春铁路管理权，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允许外蒙古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外蒙古“独立”在国际法上木已成舟，无力挽回。除了侵占外蒙古，苏联甚至在抗战胜利后的 1945 年 9 月，利用一些前伪满官员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幸亏中共中央派乌兰夫前去交涉，运用政治智慧，把蒙古族引导到地方民族自治的正道，才避免了一场民族分裂的灾难。蒋介石于 1952 年 10 月 13 日在台湾召开的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为卖国行为辩解，竟然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是

“我對於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認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作为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认为国家的一部分地区“独立”是“天经地义的事”，实在是千古奇闻、有失民族大义呀！1959年以达赖喇嘛為首的叛乱集团公然宣布“西藏独立”，这本来是国民党回归“民族主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实现民族和解，共同维护中国主权，重新得到中国人民接纳的天赐良机，但是蒋介石顽固不化，竟然再度违背民族大义，于同年3月26日发表了所谓的《告西藏同胞书》，“郑重声明”未来推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复辟后的“中华民国”政权“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达赖喇嘛為首的叛乱集团的愿望（“西藏独立”）。蒋介石集团所谓“民族自决的原则”就是允许少数民族地区脱离中国。蒋介石集团甚至给与达赖喇嘛集团大量援助。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时，苏联在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并且在新疆制造社会动乱，这本来是国民党回归“民族主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现和解，共同抵抗苏联侵略阴谋，维护领土主权，重新得到中国人民接纳的又一次天赐良机，蒋介石竟然再次违背民族大义，勾结苏联企图“反攻大陆”，建立亲苏政权（参见《台湾与苏联几次惊世骇俗的秘密接触》一文，网址：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0/1017_335_261700.shtml）。上述卖国行为说明国民党所谓的“民族主义”有名无实，早已破产。（2）就“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言，蒋介石政权统治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期间，一向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并且同后者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大陆和台湾许多少数民族都曾经是蒋介石政权错误政策的受害者。其中满族人民受害最深，根据中国台湾满族协会发表的翁福祥先生的《台湾满族的由来暨现况》一文（网页：<http://www.manchusoc.org/contents/history.htm>），“一九四九年随同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的满族中的精英（民意代表；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学者、宗教家、自由人士及公教人员）。除了少数民意代表和公教人员公开参加满族协会，其余大部分跟随政府撤退和跟随军队撤退者均改为汉姓”，不敢承认是满族。“国民党政府的人事资料上早已删除种族成份这一栏，他们认为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已被汉族同化了，根本不承认少数民族存在”，尽管大清国皇室向“中华民国”和平移交政权已经100多年，国民党不但对于大清国入关后建设多民族国家把中国领土扩大到以前的将近四倍、满族同胞为建设康乾盛世、抵抗外来侵略所做出的奉献牺牲熟视无睹，还抓住各种机会侮辱满族同胞，每到“国庆日”、青年节、元旦日都是满族同胞的“受难日”；“不仅在各种集会场合由主席首先发难开骂‘都是满清政府腐败、政府无能、受到各国欺凌、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国父’才领导国民革命、推倒满清建立‘民国’，好似没有清朝的罪恶就没有国民党的功劳。更有一些为人所不耻的香港制片人，为讨好国民党专门制作清宫戏，如慈禧西太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专门描写清朝官吏跋扈无能、欺压百姓、恶行恶状，见到外国人奴颜卑膝的陋态为能事，后来更发明了‘僵尸片’，把历代的僵尸都穿上清朝的官服、戴上红缨帽、挂上朝珠这个样子打扮成了僵尸的标帜，竟连外国片都照样模仿，因此民众百看不厌，而且国民党的政府除对民意代表无法拒绝之外，不容许满族人士为官吏，即使已经当了军人、公务员或教员也不敢表明自己的民族成份；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里一再诋毁清廷的政绩，颠倒是非，《清史稿》到目前仍是一本禁书，掌握在国史馆，所有书商不得翻印或贩售”。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一方面支持外蒙古和西藏达赖喇嘛叛国集团通过“民族自决”脱离中国，一方面对于历来拥护国家统一的“天然统”的满族同胞处处打压，如此的“民族主义”，是非标准错乱（或者说，多重标准，随心所欲，毫无底线），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说辞大相庭径。除此之外，由于

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期间，针对中国大陆实际情形所作的大量歪曲宣传，造成部分中国台湾人以及在海外的移民、尤其是“外省人”（或者叫做“蓝营”）中的一小撮极右翼“反共抗中”顽固分子对中国大陆人民存在严重偏见和歧视甚至敌视，以及少数中国台湾人在世界各地“电信诈骗”中国大陆人的犯罪事件到处泛滥，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海外华人华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些顽固分子从来没有学会在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中，同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平等相处的道理；他们没有能力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政府，复辟“中华民国”旧政权，就把对共产党的深仇大恨发泄在一般的大陆人士身上，经常在同大陆人士接触中公然用恶言恶语当面羞辱，或者造谣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政府、进行“洗脑宣传”和“策反”活动，他们在同大陆人士做生意时喜欢强加种种严重违反正常商业规矩的“霸王条款”，或者干脆进行商业欺诈。这些“蓝营”内部的一小撮极右翼“反共抗中”顽固分子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经常在同大陆人士接触时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在他们看来，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都是“吃共产党的毒奶长大的问题儿童”，“不配”同他们“平起平坐”，需要他们用所谓“三民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重新开导才能够得救重生”。因此，在他们看来，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只有两种用途：（1）做国民党“反共抗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反攻大陆”的“无硝烟战争”的炮灰，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异议人士”；（2）为“蓝营”人士或“蓝营”人士控制的机构主导的各种活动“做义工”提供“免费服务”，接受“奴工剥削”，“替共产党赎罪”。这样的怪事在美国华人社会中比比皆是，已经见怪不怪了。洛杉矶中国城福州饭店和开明书店之间有一根纪念柱，上面的中英文解说词大有问题。其中一段文字把历史年份搞错了：“1949年，大陆新政权建起了所谓的‘竹幕’，国民政府移到台湾”。英文原文是：“In 194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ut in place the so-called ‘Bamboo Curtain,’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moved to Taiwan”。正确的中文翻译应当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起了所谓的‘竹幕’，国民政府移到台湾”。该段落的翻译大概是一位“蓝营”人士，不愿意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把英文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翻译成“大陆新政权”。除此之外，“1949年，... 国民政府移到台湾”一说把年份给搞错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早在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本的受降典礼，开始代表中国统治台湾（而不是等到1949年才“移到台湾”！）。另一段文字的翻译更加离奇古怪。英文原文是“*But while the Red-baiters ruined reputations, careers, and lives, some senators were passing special bills to bring in individual Chinese who’d been caught in China when the Red Curtain closed*”。纪念柱上面的中文的翻译是“当红色政权毁坏了华人的形象、职业与生活的同时，一些众议员通过了特别的法律，让那些在‘红幕’关闭之前被留在中国的个别华人来到美国”。其中的英文 Red-baiters 一词指的是1950年代美国共和党右派政客麦卡锡参议员“反共歇斯底里”的追随者，译成中文叫作“红饵”或者是“给人扣上‘赤色分子’帽子加以迫害或攻击的反共分子”，而不是“红色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整段文字的正确译法应当是“当给人扣上‘赤色分子’帽子加以迫害或攻击的反共分子们毁坏了华人的形象、职业与生活的同时，一些众议员通过了特别的法律，让那些在‘红幕’关闭之前被留在中国的个别华人来到美国”。该段落英文原文的老美作者的原意是在批评“麦卡锡反共分子”毁坏了华人的形象、职业与生活，而不是批评“红色政权”。该段落的翻译大概是一位政治偏见很强烈的“蓝营”人士，故意曲解英文原文来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是英文水平有限。位于中国城附近旧墨西哥城的华美博物馆，不仅规模小，同附近小东京的数层楼高的日本裔美国人博物馆无法相比，十分寒惨，而且里面展出的有关抗战时期美国华人支援中国的图片文物、以及美国1960

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华人参与的图片都带有“蓝营”偏见，对于“左派”华人支援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参加“民权运动”几乎没有提及。除此之外，国民党主张“一中就是‘中华民国’”，毫无自知之明，引起美国华人社会内部长期纷争和对立。综上所述，国民党在“新版本”的“民族主义”方面是乏善可陈的。“新版本”的“民族主义”所规定的任务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成了。现在，随著 2017 年 12 月 3 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发表《北京倡议》，中国已经进入超越意识形态和历史恩怨，超越中国一国的国家利益，从全人类的视角和全球体制的立场上观察问题、贡献建设性解决方案，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习近平新时代，彻底地超越了“新版本”的“民族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今“全球村”的时代，《北京倡议》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日益上升。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我们应该树立命运与共的理念，改变独善其身的意识，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美好世界。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差异，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推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别国的利益和合理关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民族主义”观念已经落伍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假如中国继续信奉“民族主义”，就很有可能引起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不安，怀疑中国“有侵略野心”。因此，“民族主义”，无论新旧，都是应当避之而唯恐不及的。**

(2) 至于“民权主义”，“旧版本”的“民权主义”主张“建立民国”或“五权宪法”的共和制度，但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搞世袭统治加上“白色恐怖”，“民国”名不符实。“新版本”的“民权主义”，按照《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说法，“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於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於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保障遵纪守法的公民民主自由，同时对于企图勾结境外“反共抗中”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违法犯罪分子实行制裁，已经完全实现并且超越了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需要的、新型的民主政治模式，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参政，民主决策，人大政协畅所欲言，学者专家科学论证，在反映人民大众政治诉求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个中国模式既吸收了中国古代太平盛世时期圣君贤相治国安邦的传统政治智慧，“古为今用”，又符合现代国际主流社会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洋为中用”，其有效性和合理性是中国台湾统治当局实行的所谓“政党轮替”式的“民权主义”模式所无可比拟的。有中国特色的“一党领导，多党参政，民主决策”的新型政治模式行之有效，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相比之下，国民党过去在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推行“白色恐怖”和“一党专政”时期，中国人民享受的“民权”远远少于大清国和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因此当时的民间有“民国（指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的说法。这个结论是有许多事实做根据的，是永远无法翻案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受尊崇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先生说过：“民国以前，

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参见《侨报》2018年9月23日 B10版《鲁迅：这幅又硬又韧的骨头》）。这里的“前奴隶”指的就是“中华民国”血腥战乱时期，一小撮靠著“辛亥革命”造反起家、征战不休、欺压百姓、欺行霸市的军阀、官僚、党棍、土匪、政客、特务、学阀、神棍、奸商、恶霸，这些黑暗势力构成了当时所谓的“社会精英”，使国民党所谓的“民权主义”根本无法推行；“奴隶”指的是处在社会底层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者，这些人被逼到墙角，不得不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井冈山，“用枪杆子投票”，把国民党赶出大陆。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留下十分恶劣的人权纪录，其“民权主义”的说教实在令人不敢洗耳恭听。美国《太平洋时报》2015年7月22日第10版《特别报道》发表王秋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七十周年展望台湾的未来》一文中指出，从“蒋介石集团”于1949年5月9日发布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和《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到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先生宣布解除戒严令，“在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政治受难人估计高达20多万”，其中包括台湾本地人民和国民党去台人员。国民党政权利用“威权统治”优惠“外省人”歧视台湾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例如，“实施公务人员高普考试按省区分别规定录取名额的不合理制度”，大幅限制缩小台湾人的录取名额。这一政策造成占台湾总人口中少数的“外省人”（即“国民党去台人员”）在“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国营”和党营企业高层中占据多数职位的局面，引起台湾本地人民强烈不满。同时，某些居住在洛杉矶的台湾人抱怨说，国民党政权控制金融机关，商业贷款的发放中，台湾人需要严格的抵押手续，“外省人”不需要，“外省人”做生意破产由全社会买单。王秋森的文章中还指出，“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在二二八期间及之后数月被杀害的台湾人约有二万”。1949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失败后撤退去台湾军民人数高达约200万。当时台湾总人口仅有大约600万人，国民党政权遣返了大约50万日本人（网页“<http://www.wikiwand.com/zh-sg/臺灣人口史>）。上述数据等于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每12个台湾人要养1个日本人，国民党政权接收后每3个台湾人要养1个国民党难民。关于二二八事件中死伤人数，有统计的数字大约是死一万到三万人，伤一千到三万人（网页：<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二二八事件>），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滥杀无辜，许多人被杀并没有统计进去，实际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以上数字。中国台湾“解除戒严”后推行所谓“政党轮替”的模式，“白色恐怖”时期积累的族群矛盾和阶级矛盾全面激化，社会动荡，人才流失，投资意愿低落，经济衰败，“邦交国归零”为期不远，已经无法让国际华人社会大多数人认同了。所以说，**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它可以在中国台湾继续落实、改进，但是对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人民，以及全世界华人华侨中的大多数同胞而言，已经失去了现实可行性。**

（3）现在来讨论“民生主义”。“旧版本”和“新版本”都提倡“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按照《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说法，“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於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

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一书中有关民生主义的章节中还明确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叫做共产主义，或者说，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在现阶段的具体实行，而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最终归宿。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论述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国民党的实践却大相径庭。就“平均地权”而言，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的情形完全令人扼腕叹息。美国《侨报》2019年1月20日 B10 版发表《中国古代官员如何获得土地？》一文，引用中国自由派学者彭波先生的研究成果，指出“清朝入关后，一方面拉拢汉族地主，但是另一方面又对汉族地主的土地兼并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削弱了官员地主在土地占有上的优势地位，促使土地交易和土地价格的市场化。美籍华人经济史学家赵冈就说，清朝入关之后，取消了官吏优免赋役的规定，土地市场更加自由了”，清朝统治结束后，“平均地权”不仅没有实行，农民的土地落到大地主手中的现象更加恶劣，“在民国这样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军阀和官员趁乱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如北洋军阀张敬尧和倪嗣冲各拥有七八万亩以上的土地；张作霖在东北占有土地十五万余垧(每垧合十亩)。民国时期的大总统冯国璋是河北省河间人，在自己的家乡大量抢购田产，以致《新青年》说河间府的田地再也买不到了。此外，冯在苏北还占有田地七十五万亩。贿选总统的曹锟弟兄也是天津静海一带最大的地主，而且垄断了那一带的水利机关”。对于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来说，“民国不如大清”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第二次“反共”内战期间，滥发“金圆券”搜刮民间黄金，撤退到台湾时，把 700 万两黄金价值的“国”库储备、以及绝大部分故宫博物院文物搬迁到台湾，造成中国大陆人民一贫如洗，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国民党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除了以“外省人”为主的“党营企业”、“党营事业”、“国营企业”从业人员和“军公教”人员享受种种丰厚的福利之外，按照台湾某些学者的说法，推行“图利资本家、打压劳工”的经济政策，以台湾本地人为主的工人阶级和其它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极少或者根本没有，造成一个低薪水、低福利、低待遇、工时长、“过劳死”的不公不义的社会。这种不公不义的现象，在声称“劳工是最软的一块”的民主进步党统治下也少有改进。《侨报》2017年5月2日 A10 版《近万民众抗议台当局损害劳工权益》报道，5月1日劳动节台湾各地、各行业近万名劳工走上街头，高喊“反劳动剥削，要年金保障”口号，抗议台湾当局砍掉劳工 7 天法定假日，还要再砍劳保年金，损害劳工权益。《台湾时报》2017年4月5日 A5 版《低薪台湾人才外流暴增》一文报道台湾连续 10 年实质薪资没有增长，外国人不愿到台湾就业，台湾人才外流 2015 年已经超过 72 万人，其中流向中国大陆者比率最高达 58%，中高级管理人才薪资远低于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甚至赶不上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得出结论说，台湾的低薪无法吸引人才，“重金礼聘”其实是“省不下的成本”。美国某亲台湾的右翼华人报纸 2018 年 6 月 27 日 B4 版报道，台湾缺人才，78% 雇主无工可聘，超过一半的雇主找不到合适人选或应征者，包括工程师和资讯技术人员，多数雇主开始加强投资人才训练及提高薪资以解决困境。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薪资收入已经超过台湾了，所以台湾人才大量“用脚投票”，流向中国大陆，使台湾企业面临严重危机。国民党在中国台湾，除了“外省人”占据大多数职位的“军公教”享受超级丰厚的福利之外，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人民而言，并没有真正实现“民生主义”，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所谓的“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同前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搞出一个享受种种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错误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建立在压制台湾“本地人”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基本社会福利的基础上的，早已引起中国台湾人民公愤，应当尽快改良，才能够消除社会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族群对立。因此今后

国民党要在台湾浴火重生，就必须放弃极端右翼保守的“资本原始积累”模式的经济政策，“向左转”，在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和其它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的进步立法上做文章，学会站在底层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问题，设身处地为弱势群体谋幸福，才能够改变台湾大多数人民对国民党“图利资本家、压制劳工权益”的恶劣印象，争取获得支持，重新上台执政。因此，国民党要想在台湾复兴，“民生主义”不失为一面可以挥舞的旗帜。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渡时期，各地社会发展不平衡，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空间，离“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最终归宿”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因此，“民生主义”还没有完全彻底地实现，还有进步意义。但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叫做共产主义，或者说，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在现阶段的具体实行，而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最终归宿。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表示要把“中华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无法办到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发达起来。所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被前苏联捞走了。但是由于种种严重错误，前苏联失败了。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成功地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可以作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纲领（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台湾国民党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现状作不同的解释）。“民生主义”翻译成英文叫做“the Doctrine of People's Livelihood”或“socialism”（“社会主义”），所以，“民生主义统一中国”就是“社会主义统一中国”。如果中国台湾国民党人士认为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让国民党“失去尊严”的话，统一后的国名或许可以叫做“中华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其实，“人民共和国”是“白话文”的说法，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华民国”的“国号”时“五四运动”尚未发生，社会上多使用“文言文”，所以“民国”同“人民共和国”其实意思是一样的。现在是白话文时代，使用“人民共和国”才是与时俱进）。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中加上“社会主义”一词，不仅可以时刻提醒中国人、尤其是国共两党精英人士“不忘初心”，而且在国际社会中也有例可循。例如，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由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统一国民党是执政，国号叫做“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统一时有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和“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共”），统一后合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综上所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蓝营神主牌”应当送进历史博物馆了。尽管如此，“民生主义统一中国”或许可以考虑。但是，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诸多事实表明，恶性斗争不如良性竞争，良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如果说国民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同共产党“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分庭抗礼的“恶性斗争”，那么“民生主义统一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温和的“良性竞争”吧。但是“良性竞争”毕竟不如合作共赢。有鉴于此，国民党若想与时俱进，同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绝大多数保持一致，同步前行，不妨借鉴“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台湾实际，建构“有中国台湾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思想”，脱胎换骨，浴火重生。海外华人当中的有识之士，可能建议中国台湾国民党考虑的对大陆政策，不外有“上中下”三策：（1）国民党继续自唱自听地大搞分庭抗礼的“恶性斗争”，鼓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谓的“等待中共接受政党轮替再谈”的“终极统一”，或叫做“马英九主义”）是顽固不化的最下策；（2）告别一切“颜色革命”的痴心妄想、倡导和实行“民生主义统一中国”、海峡两岸“井水不犯河水”、在改善人民生活的议题上精诚合作，或者用台北市长柯文哲先生的说法，叫做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或许是中策；（3）借鉴“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建构“有中国台湾

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思想”，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尽快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才是最上策。

美国洛杉矶地区的华人华侨社区中，每年在台湾“双十节”之前均举办所谓的“中华民国国庆”活动，但是参加者逐年减少，基本上每次最多不超过五千人，基本上属于“蓝营”（中国台湾“外省人”），“绿营”人士（中国台湾本地人或“正港台湾人”）少之又少，中国大陆人士几乎没有。每年台湾植树节，“蓝营”人士都要到洛杉矶中国城旧唐人街中央广场

（Old Chinatown Central Plaza）向孙中山铜像献花，每次参加者人数都在 100 人左右。而洛杉矶华人华侨有十多万，参加此类活动者所占人口比例少得令人悲哀。事实胜于雄辩，统计数字最有权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观念已经不再为美国华人华侨社区的绝大多数人民所认同。虽然国民党的“无数革命先烈”曾经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牺牲奉献，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近百年来劫难无数，至今国家无法和平统一，只留给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人民一条真理，即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它只能满足少数资产阶级“精英”人士的贪欲，引起大多数无产者的不满与反抗而造成社会动荡。国共两党几十年内战已经对此作出了无可辩驳的结论。国民党亲日派领袖汪精卫死前写下的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心字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这首诗可以作为目前仍然死抱住“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神主牌自欺欺人的中国台湾国民党的挽歌吧。2018 年 11 月 24 日中国台湾将进行“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地方派系虽然翻盘取胜，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台湾人民拥护国民党的“分庭抗礼”路线。由于阶级、族群、和文化认同所决定的民主选举中的“力量对比”，国民党按照目前的“两面作战”的政治路线走下去，未来的中国台湾政治版图，将逐步地被“绿营”政党所占领，形成“绿营内部政党轮替，蓝营靠边站”的悲惨局面；在这一格局下，国民党可能在少数“外省籍”富人居住的“精英社区”获得选票上台执政，但是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选民占大多数人口的城市和乡村、以及大多数原住民选区，“绿营”政党将逐步巩固地盘，并且在整个台湾地区长期执政。中国台湾“绿营”政党近年来逐步打过长期被视为划分台湾“蓝绿”政治版图的分界、位于台湾中南部交界的“浊水溪”，进军“蓝营”长期控制的北部。这个趋势有点像 1949 年毛泽东主席的军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态势。这是大势所趋，难于扭转。国民党按照目前的政治路线走下去，在新台湾的政治版图中逐步被边缘化，是无法避免的。国民党如果在 2020 年选举不能获得大胜，将会受到巨大创伤，并且可能从此走向泡沫化。这一点既是危机，也是国民党弃旧图新的良机。保守而落伍的目前的国民党的败亡，可以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明进步的、未来的新的国民党的诞生创造条件。国民党目前面临亡党危局，最主要的三大原因是：

（一）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历史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在“形象上”造成包袱。

（二）中国台湾大多数选民属于低薪水、低福利、低待遇、工时长、“过劳死”的工人阶级和其它各阶层劳动人民，无法认同国民党“图利资本家、打压劳工”的“保守的”原始资本主义价值取向；2008 年，马英九挟着胜选上台，执行鼓励海峡两岸交流的政策、换取经济红利，固然有利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经济红利的大头被极少数资本家瓜分了，台湾本地工人阶级薪水不涨、甚至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扩大，台湾经济最根本困境“产业转型”无法有效解决。“产业转型”需要政府资金扶持，资本家大量投资，高工资、高

福利、高待遇吸引人才。但是国民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导思想是“原始积累型”的古典“保守派”资本主义，而不是“福利社会型”的现代“自由派”资本主义。这就注定了国民党无法引导中国台湾的资本家实现“产业转型”。

（三）国民党内部派别林立、争权夺利、无法应对“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绿营”势力的咄咄逼人。国民党要起死回生，可以采取如下对应措施：

（1）彻底解决有关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历史问题，立即主动地、毫不隐瞒地公布全部有关历史档案，停止一切无谓的辩解，与其让民主进步党政府“清算斗争”，不如对过去的罪恶历史“自行了断”，求得台湾人民谅解，告别历史，开拓未来。

（2）确立现代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和“社会企业”的进步的价值取向，把今后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劝导中国台湾的资本家阶层实行“阶级让步政策”和“社会改良主义”，制定进步的社会福利立法，为弱势群体谋幸福。

（3）消除内部分歧、整顿队伍、同所有其它“蓝营”政党、以及“绿营”中的“统派”政党建立联合阵线，共度时艰。

要实现国民党脱胎换骨、弃旧图新，再次崛起、重新出发的目的，国民党需要“第三次改造运动”。前两次改造运动中，第一次发生在 1920 年代，国民党“向左转”，借鉴苏联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模式改造组织，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政权和军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崛起。第二次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国共内战惨遭失败后，退据台湾，蒋介石总裁痛定思痛，借鉴毛泽东主席延安整风有益经验，发动“国民党改造运动”，使国民党在台湾稳住阵地。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民党因为沉重的“白色恐怖”历史包袱，已经到了“气数已尽”的生死存亡关键时刻了，必须痛下决心，实行比前两次“国民党改造运动”更加彻底的“第三次改造运动”，同过去的三大敌人（满清、北洋、中共）实现和解，接受“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先做“参政党”让大陆人民恢复信心，将来在大陆的政治中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大陆时期，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做出重大奉献牺牲，此历史事实中国百年内战中各种派别的支持者和子孙后代都是可以承认的，但是国民党不可以继续宣称抗战胜利是国民党一家的功劳，或者极力贬低其它党派的贡献。更不可以继续以公开的或秘密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方式，干预中国大陆或香港人民的内部政治事务，资助或支持“颠覆国家政权”的社会动乱。**当今的蓝营人士虽然在法律上不必为国民党历史上种种错误负任何责任，但是既然已经反省“二二八”事件，对于大陆时期错误也应当自我了断（这样对大陆人民才是公道的！）。美国夏威夷大学茹美尔教授（R.J. Rummel）写的《政府造成的死亡》

（Death By Government）一书中指出，从 1921 年到 1948 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总共杀害约 1000 万中国大陆人民。追随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去台湾的老兵们大多数孤身一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一个个的孤单的灵魂飘浮在台湾的上空，一大堆凄惨故事。蒋介石总裁的曾孙蒋友柏先生已经表示道歉了（网页：

https://www.guancha.cn/ZhangHuan/2013_01_09_119160.shtml），表示希望做新型的“蒋家第一代”，重新出发，并且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名为“常橙”的设计公司（网页：<http://dem-global.com/about/>）。这种开明进步的立场值得赞赏。希望所有“蓝营”人士都能够如此实行。国民党大陆时期过大于功（两分半成绩即抗战，七分半错误即颠覆大清、北洋合法政府、屠杀中共人士、出卖外蒙古主权），台湾时期功大于过（六分成绩即建设台湾并实现

民主，四分错误即“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勾结前苏联企图“反攻大陆”重新挑起内战、支持西藏达赖喇嘛集团叛乱、插手制造中国大陆和香港社会动乱、及目前内斗）。希望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外省人后代能够认识到，虽然现今的台湾蓝营人士在法律上没有必要为蒋介石、蒋经国统治集团历史上对海峡两岸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他们在中华各民族列祖列宗在天之灵面前，在自己做人的良心面前，绝对有责任正确认识这一段不幸的历史，向海峡两岸人民鞠躬谢罪，放弃继续以“中华民国”名义或者“一中各表”、“终极统一”、“中华民国还要继续生存一百年”、“两岸同属一中，一中就是中华民国”的自欺欺人、模棱两可的说辞，敷衍抵制海内外中华各民族人民和平统一的呼声，放弃所谓的“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一国良制”、“平反六四”的不切实际的非分要求，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可行性方案，废止已经被海峡两岸人民抛弃的、带有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色彩、违反现代社会民主进步潮流的“中华民国”旧“国号”、旧年号、《三民主义》旧“国歌”、青天白日满地红旧“国旗”，实行自我清算，自我斗争，自我革命，自我改良，同过去的血腥恐怖历史及其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完全切割，丢掉“政治反攻大陆”的幻想、丢掉“白色恐怖”时期占据“军公教”体系大量官位、享受种种特权优惠而形成的“高人一等”的不健康心态，做纯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新公民，同海峡两岸人民实现彻底和解，才能够脱胎换骨、浴火重生，走出阴暗，回归光明。否则，将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中，被海内外大中华各民族人民所边缘化。当今的蓝营人士只有实行自我清算，自我革命，自我斗争，同过去血腥恐怖的历史切割，才能够弃旧图新，脱胎换骨，让国民党重新得到海内外中华各民族人民的接纳，浴火重生。国民党只要有勇气告别“革命”，拥抱改良，超越历史，立足现实，开拓未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